

（上接 13 版）李白和元演经过孟津浮桥，由南而北，大约再步行两三天，便会看到官道如一条扭曲的长蛇，慢慢游进西北天际一列拔地而起的山脉中。

那便是太行山。八百里太行呈东北—西南走向，成为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的天然分界线。有一年 4 月，我在南太行寻访一条名叫羊肠坂的古道。沁阳往北十多公里，通往晋城的公路进入了深山。当年，李白和元演就是从平原尽头的沁阳西北而行穿越南太行的。1000 多年过去了，公路斗折蛇行，时而爬上半山，时而跌进山谷。太行山到处是坚硬的火岗岩石头，年久风化后，坚硬的石头缝里，钻出一棵棵连翘和桃树，淡黄的连翘花和粉红的桃花，给阴雨的下午带来了一点点春天的暖意。

与残留的古道相比，曲折的公路依然显得平缓而宽阔。羊肠坂的得名，便是缘于古道崎岖缠绕，有如羊肠。

查史料可知，羊肠坂虽只有短短几公里，却因扼京洛之咽喉，加之易守难攻，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据说，曹操的《苦寒行》就写于此：“北上太行山，艰哉何巍巍！羊肠坂诘屈，车轮为之摧。”很多年后，李白在写给元演的诗中，历数和元演在一起的旧时光，其中就有对当年行经羊肠坂的艰辛记忆：“五月相呼渡太行，摧轮不道羊肠苦。”

北游太原时的李白，虽然仕途上一事无成，诗名却已遍及海内。元演的父亲元府尹对他的到来给予了极为热情的接待。李白诗作表明，他在太原待了一年左右。其间，他和元演曾北游雁门关。更多时候，他们在太原周边载酒游荡，曾经多次前往太原南边的晋祠。

晋祠的历史极为悠久，最初是为纪念晋国开国之君唐叔虞而建。晋祠里，一株株着生长的古柏别具风姿——自周朝时被栽种于这里，它已经在多少代人的注视下生长了 2600 年以上——即便李白时代，它也差不多有一千多岁了。可以肯定地说，李白和元演都见过它。只是，有可能，那时，它的身子不像现在这样歪斜。

在太原，李白一度萌生了从军的念头。李白一直对自己的剑术颇为自负。他认为，如果从军，或许有机会成为一个好将领，进而以立功边关的方式空降到官场，甚至博个封妻荫子。

元演制止了他。元演告诉他，军营生活远不是他看到的那么浪漫与威风。他的父亲守边多年，早该调回内地，可因朝中无人，很可能就终老太原。元演的父亲如此，他手下军官的前途更加黯淡。

李白是个激情四射的人，激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既然从军也不会有光明前景，他便写诗批评军中的种种不公：“苦战功不赏，忠诚难可宣。谁怜李飞将？白首没三边。”

一年多后的初秋，李白辞别元府尹。元府尹给了他丰厚的馈赠，银两之外，还有一匹五花马，一件千金裘，归往安陆途中，李白又一次拜访了老友元丹丘，并经元丹丘介绍，结识了新朋友岑勋。李白与元、岑二人痛饮之余，写下了他最著名的诗篇《将进酒》。诗里，他无不得意地提到元府尹的厚赐：“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”

功名：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

李白又一次走进了巍峨的长安城。一入长安与二入长安之间，有 12 年的间隔。李白从 30 岁到了 42 岁。40 岁前后两年，李白遭遇了颇多变故。人们常说哀乐中年，其实，以哀为乐，以乐为辅。或者说，乐只是哀的海洋中耸立的一座座孤独的小岛而已。从太原归安陆后，李白罕见地在家待了一年。读书、写诗、饮酒成为这一年的日常。但一年似乎也是他能安静下来的时间极限，他很快就“恨不能挂长绳于青天”，担心岁月流逝，马齿加长而功名未就。毕竟，在人均寿命四五十岁的时代，年近不惑，实在是到了令人恐慌的年龄。

38 岁那年，李白做了一次行程万里的巡回干谒。他先后在南阳、颍阳、宋城、下邳、扬州、杭州、温州、荆州、襄阳等地，拜访了数十位大大小小的地方官，陪他们喝酒，为他们吟诗、作文，像一个恪尽职守的营销员，努力推销自己。

所有的努力却一无所获——如果一定要说的话，那就是回收了一场场大醉，以及一些或真或假的赞美。为此，李白愤愤不平地写诗：“空谒苍梧帝，徒寻溟海仙。已闻蓬海浅，岂见三桃园”，他借用寻仙不遇的典故，讽刺朝廷广开才路之说不过空文虚言，根本准备落到实处。

39 岁那年，李白作了父亲，他的女儿平阳出生了；41 岁那年，他的儿子伯禽又出生了。

不惑之年也是一个丧乱之年。这年，万里干谒归来的李白到襄阳拜访孟浩然——很可能要回到这位老友倾诉

一番苦水吧。到了孟家却惊闻噩耗：孟浩然竟于月前去世了。

孟浩然死于友情和诗情。此前，他背上长了一种古人称为痂疽的毒疮——现代医学认为，这是皮肤的毛囊炎和皮脂腺被葡萄球菌感染所致。项羽最重要的谋士范增就是得此病而死的。孟浩然的病原本在好转，不料，王昌龄来了。诗友相聚，免不了觥筹交错。要命的是，医嘱孟浩然不得食用河蚌，偏偏桌上有一道孟浩然最喜欢的汉水查头鲊。纵情之下，孟浩然忘了医嘱，大吃特吃。于是，悲剧了，“浪情宴谑，食鲜发动”而终。

如果说孟浩然之死让李白意外而伤感的话，那么，另一个人的死则直接改变了他的生活——李白结束了“酒隐安陆，蹉跎十年”的安陆岁月。这个人，就是许氏。许氏出身豪门，自李白婚后，聚少离多。当李白漫游天下时，她默默地守候于小城安陆。体弱多病的许氏去世后，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。

许氏既死，李白再也没有留在许家的理由。对安陆这座小城，他大概也失去了继续居住的兴趣。李白搬迁了。目的地是山东鲁郡，即山东兖州。选择鲁郡，很可能是因为李白的一个堂叔和几个族亲都在那里做官。到了鲁郡，在族人帮助下，他在瑕丘（今济宁市兖州区）东门外筑了几间茅屋，购了几亩地，并先后与一个姓刘的女子和一个没有留下姓氏的女子同居。后者为他生了另一个儿子颇黎。种种蛛丝马迹表明，李白与刘氏在一起的时间很短，并且，最令李白愤怒的是，同居后，刘氏很快对李白由失望到绝望，竟然跟人私奔了。李白在诗里痛骂这个不识好歹的妇人：“彼妇人之猖狂，不如鹤之强强；彼妇人之淫昏，不如鹤之奔奔。”

刘氏对李白的失望与绝望，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：首先是反感他无度饮酒。更大原因可能是眼见李白年过 40，就连七品八品的小官都没捞着，不免渐渐从内心瞧不起他——奴婢眼里无英雄，奴婢眼里也无诗仙。

郁郁寡欢中，李白去了一趟嵩山。那里，有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元丹丘。今天，从兖州到嵩山，高速公路 400 多公里，驾车约 5 个小时，但在李白的唐朝，至少要耗费十几天。餐风露宿半个月，李白赶到颍阳山居，不是为了聚会，而是为了告别——他专程去为元丹丘送行。

作为当时全国知名的道士，元丹丘新近接到朝廷要他赴京的诏令。从兖州到嵩山，甚至超过了从嵩山到长安，李白如此不辞辛苦地送行，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友情——这就好比有个上海的朋友要去北京，我竟然从成都赶到上海为他送行。

李白在诗里透露了这次独特送行的目的：他希望元丹丘到京后，向朝廷举荐他。

元丹丘果然不负厚望。次年秋，来自长安的使者送来了宣李白入朝的诏令——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变成活生生的现实，李白的狂喜可想而知。他一边杀鸡酌酒，一边痛骂离他而去的刘氏不长眼睛——此时，李白应该与鲁妇生活在一起。否则，李白出游时，谁来照料年幼的孩子？从他接到诏命后写给老婆孩子的那首诗看，他青春时期就浓烈的政治狂热竟一点也没消退，反而因突如其来的诏命而狂喜、而失态：

白酒新熟山中归，黄鸡啄黍秋正肥。呼童烹鸡酌白酒，儿女嬉笑牵人衣。高歌取醉欲自慰，起舞落日争光辉。游说万苦苦不早，著鞭跨马追逐远。会惜愚妇轻买臣，余亦辞家西入秦。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。

无论什么时代，首都总是一个庄严的词语。它意味着宏伟的建筑，肥马轻裘的高官和从这里发往王朝每一寸版图的道道旨意。早春二月，燕子斜飞，它们轻盈的翅膀扇动了护城河边细长的柳丝，却扇不动城楼上那一排排卫土从不斜视的目光。

1961 年，经过 4 年多的发掘，一座消失于历史长河的古城浮现在 20 世纪的阳光下。这座一梦千年的古城，承载的是后人艳羡不已的大唐华章，它那庞大的规模表明，极盛时，这里的居民至少在 200 万以上。

发掘证明，唐代长安城的周长有 70 多里，比今天的西安旧城（即明清时代的西安城址）大 5 倍。至于向来被人称道的北京旧城，其面积也仅和长安相差无几，长安却要早它好几百年。

凝视专家绘制的唐代长安城复原图，我发现这座古老而奢华的城市就像一只巨大的棋盘：一条叫朱雀大街的大道笔直地从北到南，把长安城切成东西两部。朱雀大街的宽度，考古实测为 155 米，足以并行 45 辆马车。朱雀大街两侧各有 5 条平行大街，与 14 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垂直相交。每 4 条街道围合成一个居民里坊，里坊内部也有东西向和南北向的道路切割成住宅区。然后是无数小一些的街道，它们也以笔直的线条硬朗朗地划过城市。白居易在描写长安时，用了这样的诗句：

长风万里



大型秦腔新编历史剧《李白长安行》首演现场。该剧是首个以“李白”为主角的秦腔剧目，讲述了诗人李白第二次进入长安之后的故事。

新华社资料片(记者刘潇摄)

“百千家似围棋局，十二街如种菜畦。”

顾炎武感叹：“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，其城郭必皆宽广，街道必皆正直。麻舍之为唐旧创者，其基址必皆弘敞。宋以下所置，时弥近者制弥陋。”

盛唐伟大而深远的影响，不仅是它余下的城郭宽广和街道方直那么简单，它更以这些外在的、物化的东西提醒我们：中国历史上，曾有那么一个鲜明生动，富于青春与朝气的自信时代和宽容时代。学者周哲存对此总结说：“盛世其实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满足感，一种在物质充盈的前提下心境的宁静与自豪，一种无处不在的，仿佛触摸得到的富裕、繁荣和安全感。”

印象派大师塞尚初到巴黎时曾放狠话，说他要以一只苹果征服这座骄傲而虚伪的城市。后来证明，他做到了。这座城市如今以他为荣。李白肯定也想过要用他的诗歌征服长安。第一次，他失败了；第二次，除了元丹丘通过玉真公主向唐玄宗举荐外，他巨大的诗名已经海内共知。所以，他几乎算成功了。

细数与李白有较多交往的朋友，论才气或名气，贺知章都只是比较普通的一个。若论爽快与真性情，贺知章却名列前茅。李白在长安等待圣上召见的日子没有白过，他结识了贺知章。唐朝最好酒的两个人相遇了，像两只酒瓮一样惺惺相惜，灵犀相通。

贺知章生于公元 659 年，比李白大了 42 岁，相当于老师赵蕤和李白的差距。他不仅年龄大，社会地位也高，做过部长级的太子宾客和秘书监。他在朝 50 年，耳濡目染，长安这座大染缸般的名利场却没把他改变，他还是名士风流的真本色。这位热爱美酒和诗歌的长须老翁首先是性情中人，然后是一流的酒鬼和诗人。李白与贺知章的交往时间不长，感情却很深。李白对贺知章所给予他的谪仙人的称号，既得意又感动。后来，当贺知章病逝于遥远的山阴，李白为他写了《对酒忆贺监二首》。序中，他不无动容地写道：“太子宾客贺公，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，呼余为谪仙人，因解金龟换酒为乐。然犹有怀，而作是诗。”

纵情诗酒中，李白终于等来了唐玄宗的接见。从有关记载看，唐玄宗接见时的讲话让李白激动不已，因为他的陛下如此平易近人。李阳冰在《草堂集序》中称，李白进入大殿后，李隆基不仅“降辇步迎，如见畴昔”，甚至“以七宝床赐食，御手调羹以饭之”，他像个文学青年似地拉着李白的手说：“卿是布衣，名为朕知，非素蓄道义，何以至此？”

接下来的安排却令李白如遭当头闷棍——李白一辈子想的就是出将入相，像他的朋友杜甫说的那样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。要实现这样的政治理想，只有做到高级官员才有可能。然而，李隆基给李白的身份却是翰林供奉。所谓翰林供奉不过是唐朝时养在内庭的一种级别很低的从官，只要一有才一艺——斗鸡养狗、写诗作画都算——就有可能授予这一头衔。严格地讲，它根本不算官，其地位和供皇帝解闷逗乐的侏儒小丑并没太大区别。

李白的失望可想而知，其情其景，就好比追求半世的女人终于请你夜半前往后花园赴约，没想到不是她接受了你的爱，而是要把你介绍给她家嫁不出去的老保姆。

西安城的东部有一座风光绮丽的公园，一汪碧水荡漾在蓝天丽日下，山上的高塔低树倒映湖中，这就是西安人熟知的兴庆宫公园。和众多仅供游人憩息的公园不同，兴庆宫公园大有来头——它建在大唐兴庆宫遗址上。那汪面积并不大的湖，它的前身据说是兴庆宫中有一个龙池。李世民、武则天、李隆基，这个个声名显赫的大人

物，他们的身影也曾像今天的市民一样出没于夹岸的柳荫下，细雨中的涟漪同样见证过他们的锦瑟年华。

兴庆宫栽种了许多牡丹。周敦颐说“自李唐来，世人甚爱牡丹”，可见花开富贵的牡丹是唐人至爱。这年春天，兴庆宫中的牡丹开得又大又艳，兴致勃勃的唐玄宗与杨贵妃一同赏花饮酒。助兴的是宫廷音乐家李龟年率领的宫中队乐。一时间丝竹如云，清歌如雨。唱得欢快时，唐玄宗忽然摆手叫停。如此良辰美景，他不想再听陈词老调，于是下旨去请最近供奉翰林的李白来写几首新词。

李白没有描绘牡丹的美丽与春天的美好，甚至也没有借景抒情歌颂唐玄宗的盛世，他只赞美女人——唐玄宗一生中最宠爱的杨贵妃：

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一个纵横江湖的剑客，一个举杯邀明月的酒鬼，一个横空出世的诗人，一个以大鹏自况的幻想家，没想到一下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帮闲的御用文人。

坦率地说，这些遵命文字依然有才华得光芒透纸背，依然像李白的其他作品那样可圈可点。可一旦联想到这些文字背后若隐若现的皇权对文学的强暴，总让人产生某种难以释怀的辛酸。文人要想安身立命，难免写点遵命文学，这是包括李白在内的文人的软肋。

二人相交，前后 3 年，近 2000 个日子如同那件日益破烂的客袍，缓慢而又固执地旧了。

翰林供奉位置尴尬，地位低下。这不是李白要的，更不是李白的理想。李白之前 1000 余年，孔夫子说过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的气话——如果不能在人间实现我的理想，那我就坐上大船漂流到海上去做个世外逸民吧。

3 年的张望与待诏，3 年的酒局与饭局，3 年的烟花与落拓，当长安酒肆中的胡姬们大抵识得这位“眸子炯然，哆如饿虎”的相公时，李白打算像孔子那样离开。再不离开就是一种痛苦的折磨——虽然离开也是另一种痛苦的折磨。对这位一生只有在奔走中才能感受到自由呼吸的诗人来说，李白听到了闲居的日子里，关节发出“吱吱吱”生锈的声音。

天下最宽阔的街道集中在这里，天下最宏伟的园林集中在这里，天下最热闹的市井集中在这里，天下最显赫的官员集中在这里，天下最妩媚的女子集中在这里……这就是长安，李白即将告别的长安。

之前，他已经意兴萧索地送一个友人离开，那就是忘年交贺知章。天宝三年（公元 744 年），贺知章告老还乡，李白深情难舍，以《送贺宾客归越》赠别——送一个 80 多岁的老者前往 3000 里外的故乡，既是生离，也是死别：

镜湖流水漾清波，狂客归舟逸兴多。山阴道士如相见，应写黄庭换白鹅。

江湖：飞蓬各自远，且尽手中杯

大师与大师的相逢，为苍白的历史增添了一道靓丽的红晕。

在我看来，漫游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之河，共有 3 次大师与大师的相逢值得永久追怀：一次是春秋时代孔子与老子的相逢，两位大哲的思想在交锋，如同两道光照千秋的火焰。一次是 1167 年，同为理学大师的朱熹和张栻相聚于风景秀丽的长沙岳麓书院，以理学为中心展开对话，上千名知识分子有幸共沾雨露。还有一次伟大的相逢发生于天宝三年夏天，那就是李白与杜甫的握手。两只托起唐诗天空的手在洛阳相握，闻一多将之比喻为太阳与月亮的会面，说是千载相逢的祥瑞。

大师与大师相逢并成为朋友，在文化史上是一起重大事件，但对斯时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自身历史价值的当事人李白来讲，从长安到洛阳，他郁闷的心情并没有得到根本排解；而与杜甫的相逢和相遇，以及后来共同漫游北方大地，他苦闷的心境才如同冰山一样，在友谊与理解的阳光下化成渐次远去的春水。

文人是一种特别容易感到孤独的动物。把他们单个地放入人群，他们往往会以近乎抱残守缺的方式小心呵护自己，一旦把他们集合在一起，他们的情绪就会因彼此的刺激和鼓动，变得格外昂扬外露。大师也不例外。

出走长安的落寞与伤感变成了相逢的酒杯和诗话。这一年，李白 44 岁，杜甫 33 岁。

即使满打满算，李白与杜甫在一起的日子也非常短暂。虽然我们无法考证出他们在洛阳偶然相逢的具体细节，但可以大致推算出那个日子是在天宝三年初夏，而他们各分东西则是在次年深秋，时间只有一年多，这一年多也并非天天朝夕相处，而是像不同的星座有不同的运行轨道一样，他们只是偶尔相遇。

友谊是一种奇怪的东西，大师的友谊则是一种更奇怪的东西。按照文人较轻的定势，两个大师就像两只个性刚烈的刺猬，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才不至于互相伤害。但任何事情都有例外，某些大师之间确乎存在真挚感人的友谊——比如席勒与歌德，福楼拜与莫泊桑，比如我正在说的李白与杜甫。

和李白张扬外露的性格迥然相异，比李白小 11 岁的杜甫是一个严谨内向的人。无端地，如果让我为他们二人造像，那么李白身材修长，有几分不食人间烟火的道貌仙风；杜甫面容清瘦，双眉紧锁，目光内敛，嘴角紧抿，像在努力克制内心世界的忧愤百集。

这是两个性格反差很大的人，看上去不太可能成为朋友。但他们仿佛为了给后人一个意外，虽然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，坚韧的友谊却像一道施明长夜的烛光，一直贯穿了他们此后悲欢交集的人生。

有论者以为，李白和杜甫之间的友谊是一种不平等的友谊，理由是杜甫写过 10 首以上的诗寄赠或怀念李白，李白却很少回报杜甫的深情。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把友量化了，好像馈赠诗歌的多少直接和友谊的深厚成正比，从而忘记了李白有着不拘小节的大兄性格。他们在一起的那些有酒盈樽的日子，日后仍然会反复在李白心里回荡，如深情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便是李白的深情流露：

我来竟何事？高卧沙丘城。城边有古树，日夕连秋声。鲁酒不可醉，齐歌空复情。思君若汶水，浩荡寄南征。

随即加入李杜友谊圈的是另一位同样大名鼎鼎的诗人，即边塞诗领军人物高适。高适字达夫，字仲武，其人生经历颇富传奇色彩。《唐才子传》称他“少性拓落，不拘小节，耻预常科，隐迹游侠，才名便远”。年轻时，他宁肯混迹于赌徒中也不愿参加科举考试，没想到这么一干，名气却更大了。高适后来做过名将哥舒翰的幕僚，因缘际会，出任蜀州、彭州等地刺史，官终左散骑常侍，封渤海县侯，仕途甚为得意，以至《旧唐书·高适传》说：“有唐以来，诗人之达者，唯适而已。”

历史留下的只言片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佐证，那就是与杜甫相比，高适的性格更接近李白，但真正被李白放到了心灵深处的却是沉默少言，显得有些迂腐的杜甫——高适当然也是李白的朋友，只不过就像山峰有高低一样，友谊也有轻重。

粗略梳理一下杂乱无章的史料，大致可以为李白与杜甫的漫游画一个粗线条的纪要：

天宝三年初夏，李杜初逢于洛阳。几场剧饮后，二人分手。不久，两人再次相遇，尔后在商丘一带遇到高适，三人一起漫游梁宋。

天宝四年春天，三人同游齐州，也就是今天的济南，受到北海太守李邕的热情接待——他就是李白青年时干谒过的渝州刺史。说起往事，李邕一再致歉。

开封是一座活在往事里的城市。这座从首都降为省会，再从省会降为普通地级市的城市，曾有过太多的繁华与艳丽。七朝古都，南北通衢，北宋时它世界最大的都市……这些都是它的曾经。但是，千古繁华余一梦，换了人间。而今，这座繁华的城市不比周围其他城市多一些亮色——除了难以计数的古迹表明，它在历史上曾经“比你阔多了”。

禹王台是开封城里众多古迹中的一个，它还有另一个略显古怪的名字：吹台。相传春秋时期，晋国有一位像荷马一样盲了双眼的音乐家，名叫师旷。此人常常跑到今天的禹王台一带吹奏，那时候的禹王台只是平原上乳房一样隆起的一座土丘。久而久之，人们

把这里叫做吹台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
师旷太久远，吹台最真实的历史其实和李白有关——李白已成为吹台最值得骄傲的本钱，和李白一起给予了吹台乃至开封无上荣光的，还有李白的朋友杜甫和高适。

《唐才子传》高适条目下关于三位大师和吹台的故事如是说：“尝过汴州，与李白、杜甫会，酒酣登吹台，慷慨悲歌，临风怀古，人莫测也。”看来，当时世人眼里，李、杜、高三位诗人光临吹台，他们在风中悲歌长啸，让当地人感到十分不解——对生活经验以外的陌生事物，常人往往条件反射地投以怀疑目光。

吹台却是幸运的，它幸运地聆听了三位大师酒后的高歌，见证了他们如何在蝉声如雨的夕阳下栏杆拍遍，直到又大又圆的月亮从吹台另一侧的平原上慢腾腾地挪到天际。

李白、杜甫，还要加上一个高适，他们之间的友谊之所以令后人眼热，在于他们是真正的道义之交、文字之交。这种至高无上的友谊别无他求，像源自深山的清泉，因纯洁而熠熠生辉。

所以有不少后人为此感动。三贤祠便是感动的产物——明朝河南道监察御史毛伯温有感于李、杜、高同游吹台的事迹，修建了一座名为三贤祠的祠堂。这座建于明正德十二年（公元 1517 年）的小院，位于禹王台大殿东侧。在纪念治水英雄大禹的庙宇里，诗人们也赢得了一席之地。

高适告辞后，李白和杜甫继续漫游，二人一同拜访一位姓范的隐士，并兴致勃勃地写了同一题材的作品。此后，两人分手。过了不久，却在饭颗山头有过一次偶遇，为此李白作《戏赠杜甫》：“饭颗山头逢杜甫，头戴笠子日卓午。借问别来太瘦生，总为从前作诗苦。”杜甫亦以《赠李白》作答：“秋来相顾尚飘蓬，未就丹砂愧葛洪。痛饮狂歌空度日，飞扬跋扈为谁雄？”

石门山位于曲阜东北，公路延伸到山麓时，路旁立着一块巨石，上面是红色的楷体大字：石门山。作为一个地方性旅游景区，石门山并不算知名——当然，如果你知道据说孔子就在这里撰写《易经·系辞》的话，或许会对这座主峰也不到 400 米的山肃然起敬。

那一年，漫游、剧谈和狂饮是李、杜的常态，但这种基于诗酒的友谊即将画上句号：天宝四年深秋，分手的时候到了。此前一年多，他们也经常分手，但因为都居住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，那种分别只能算暂别，就好比同城居住的朋友，每一次聚会后同样要分手，可没人把它当作分别。只有当同城的朋友迁往异地他乡时，才猛然觉悟到相聚的日子真要戛然而止了。

在石门山，唐诗天空最明亮的两颗恒星斗酒别筵，杜甫后来的诗说他们是“渭北春天树，江东日暮云”，意指他将前往西北定居，如同春天的古树；李白将漫游东南，好似日暮的浮云。

美国传记作家欧文·斯通说，“人是用无法告别画出来的”。诚哉斯言。对于告别的悲怆与隐痛，任何艺术表达终究苍白无力。石门一别，两位大师都写下了关于友谊和怀念的略带伤感的诗篇，这些诗篇见证了他们诗酒欢娱的日子，也预示着此后将隔着茫茫世事和迢迢烟水空寄思念，如李白的《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》：

醉别复几日，登临遍池台。何时石门路，重有金樽开。秋波落泗水，海色明徂徕。

飞蓬各自远，且尽手中杯。

在石门山，李、杜以一场酒告别——尽管他们认为，以后还会有机会再将杯子碰到一起，但事实上，从那以后，他们天各一方，只能在有限的梦里相见。

石门一别，李白和杜甫再也没有见过。在交通极为艰难，也没有任何现代通讯工具的古代，回忆和祝福就是我们的祖先思念亲朋时可以依凭的可怜的办法。作为小兄弟的杜甫将在以后的岁月里，一次次地回想起李白，回想起在中原大地上与李白剑飘零的流金岁月。杜甫一生写过不少赠送或怀念朋友的诗，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，首推写李白者。多年以后，杜甫在历经了“朝叩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”的人世辛酸后，头发花白了，额上刻下了时光的痕迹。这时，他再一次想到了分别多年的李白。杜甫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首怀念李白的诗，诗题就叫《不见》，题下则注“近无李白消息”：

不见李生久，徂狂真可哀。世人皆欲杀，吾意独怜才。敏捷诗千首，飘零酒一杯。匡山读书处，头白好归来。